

核心阅读

11月26日,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十次集体学习时强调,“重视吸取历史经验是我们党的一个好传统。历史记述了前人的成功和失败,重视、研究、借鉴历史,了解历史上治乱兴衰规律,可以给我们带来很多了解昨天、把握今天、开创明天的启示”。就吏治问题而言,我国历史有着极为丰富的素材,鉴其得,察其失,可为当前建设高素质干部队伍提供镜鉴。

王学斌

三国蜀汉政治家诸葛亮曾主张治国理政“务在举贤”“为人择官者乱,为官择人者治”,如此方是正确选拔人才之法。可见选人用人自古便是传统吏治的关键内容。

为政之要，惟在得人

国以人兴，政以才治，无论国家

治理，抑或地方治理，选人用人都是不可或缺、重中之重的工作，恰如东汉学者王符所形容的，“治世不得真贤，譬犹治疾不得真药也”。

回首中国历代王朝鼎革变迁，人才往往是第一位的因素。汉高祖刘邦在总结西汉建立的成功经验时，认为关键所在便是得人：“夫运筹策帷帐之中，决胜于千里之外，吾不如子房（张良）。镇国家，抚百姓，给饷餉，不绝粮道，吾不如萧何。连百万之军，战必胜，攻必取，吾不如韩信。此三者，皆人杰也，吾能用之，此吾所以取天下也。”汉初三杰之综合素养，在当时众多俊杰中属于上上选，他们的功业造就了西汉开国的气象与规模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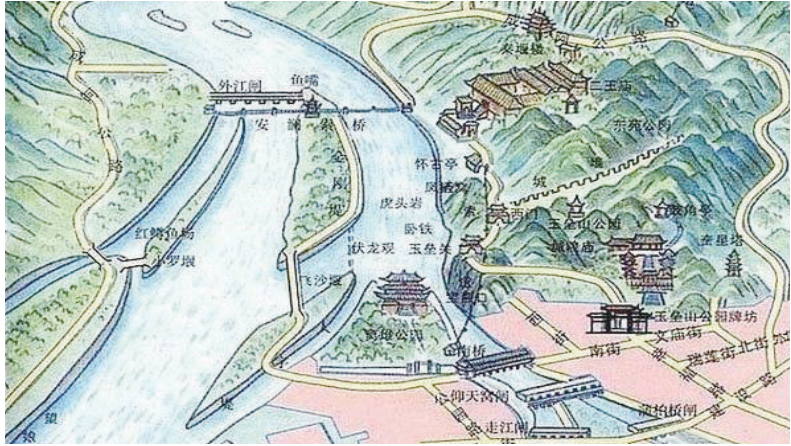
无独有偶，唐代盛世局面的出现，也多与政府善于得人密切相关。唐太宗以亡隋为戒，用人唯贤，于是决策时有房谋杜断，纳谏时有魏徵、马周，用兵时有李靖、秦琼，集一时之贤能，迎来了贞观之治。唐玄宗延续太宗之风，在吏治方面严加整饬，善用良材，先后任命姚崇、宋璟、韩休、张九龄诸人为相，朝局趋于稳定，终于形成了杜甫《忆昔》一诗中

所描绘的开元盛世，政治制度上“百余年间未灾变，叔孙礼乐萧何律”，经济建设上“稻米流脂粟米白，公私仓廩俱丰实”，文化发展上“官中圣人奏云门，天下朋友皆胶漆”，社会秩序上“九州道路无豺虎，远行不劳吉日出”，堪为古代治世的典范。

与此同时，值得后人深思的是，盛唐走向衰落，也与人才使用密切相关。玄宗执政后期，宠信李林甫、安禄山等佞相乱臣，危机暗中累积滋长，导致安史之乱爆发，政局混乱不堪，“洛阳宫殿烧焚尽，宗庙新除狐兔穴”，百姓流离失所，“岂闻一缗直万钱，有田种谷今流血”。难怪杜甫哀叹“伤心不忍问耆旧，复恐初从乱离说”。人才关乎国运兴衰，关乎事业成败，“治乱必于斯，兴亡必于斯”，需要认真总结与研究。

用人之要，选贤任能

《管子·立政》专对国家治乱之原有过精到剖析：“一曰德不当其位；二曰功不当其禄；三曰能不当其官。”倘若大臣的德行与地位不相称，功劳与俸禄不相称，能力与官职不相称，让



秦时都江堰

小国的步伐一直没有停止，从军事、经济、文化等多个层面推动蜀地与秦国本土的融合。蜀地的语言文化、精神风貌都有了深刻的变化。蜀人学会了秦国语言，到了西汉的时候，古蜀语已经基本消失，“言语与华同”。

秦昭襄王时期，李冰被任命为蜀郡太守，主持修建了以都江堰为代表的众多水利工程，奠定了蜀地天府之国的基础，把蜀地变成了秦国的重要粮食基地。在此后秦围统一天下的过程中，无论是长平之战，还是灭楚之战，秦军都没有发生缺粮的问题。“秦地半天下，粟如丘山”，这是秦军横行天下的底气。反观赵国，缺粮是其长平之败的导火索。

分而治之

同为新地，秦对巴和蜀的策略是不同的。秦在关中立国，治理平原地区的经验非常丰富，对于治蜀一揽子成熟方案，但巴国山地纵横，丘陵交错，秦军主力难以深入腹地，实现真正有效管制。同时期的罗马军团在山地作战难以施展、屡屡吃亏，秦却知难而进、尺寸为功。

昭襄王时代，曾有“白虎”为害巴蜀的传说。“秦王乃重募国中，有能杀虎者，邑万家，金帛称之。”重赏之下，必有勇夫，“虎历四郡，害千二百人，一朝患除，功莫大焉”。秦治巴蜀不只是传说，消灭白虎只是一个柔化后的故事，实质是秦巧妙分化巴国境内的各派部落势力，巩固对新得土地的统治。

这种推测是有依据的。秦汉之际，巴中、黔中地区的“濮君蛮”部落崇拜白虎，奉祀白虎为神；而沿嘉陵江而居的“板楯蛮”部落，骁勇善战，以射杀白虎为荣。一者敬畏白虎，一者与白虎为敌，针对对麦芒的传统风俗背后是刀光剑影的历史往事。

具有能力的小人擅权上位，那么这个国家极可能陷入是非不明、政令不通、正道不行、祸乱不已的险境。这实际上提出了为政者该如何权衡官吏德行与才干关系的命题。

降至北宋，史学家司马光在其《资治通鉴》开篇就借春秋末年晋国荀瑶（时人尊称智伯）覆亡的教训，对德才关系进行了系统讨论。在司马光看来，“智伯之亡也，才胜德也”。他才华出众，但德行有亏，走向绝路纯属咎由自取。司马光将人分为四种：德才兼备者堪称“圣人”，有德才弱者是“君子”，有才无德者视之为“小人”，无德无才者只能归为“愚人”。众所周知，在古人心中，圣人不多有，但用人问题一直存在，所以一旦遭遇人事任免提拔，“苟不得圣人，君子而与之，与其得小人，不若得愚人”。在今人看来，这种宁要无能之辈，不用有才之人的做法，恐怕不利于社会的发展，事业的进行。然而，司马光此主张的背后，有着更为深沉的忧虑与思考：“才者，德之资也；德者，才之帅也。”才干，是德行的辅助资本，德行，是才干的中心统帅。二者合则双美，分离却未必两伤。因为

德行胜过才干之人，他至少是个君子，如果才干盖过德行，他便是“挟才以为恶”的小人，其后果不堪设想。自古以来，乱臣贼子，大多“才有余而德不足，以至于颠覆者多矣”，荀瑶不就是活生生的例子吗？言及此处，司马光又补上一句，希望主政者在用人方面，“能审于才德之分而知所先后”，真正拿捏清楚德才二者的关系。可惜历来统治者往往难辨善恶，重用小人，政局最终无可收拾。是故司马光“与其得小人，不若得愚人”观点的提出，透露着他阅尽前史后的清醒与无奈。

殷鉴并不遥远，距离司马光差不多二百年前的唐朝中期，就发生过小人作恶的悲剧。当时朝中有两位重臣：刘晏与杨炎。刘晏颇有政德，为官清明，史书有载其“常以办政务，在于得人，故必择通敏精悍廉勤之士而用之”。同时他精通财政，体恤民艰，任职期间推行了一系列经济改革，“广军国之用，未尝有搜求苛敛于民”，为安史之乱后唐朝经济恢复与民生稳定作出了卓越贡献。按照司马光的标准，刘晏算得上德才兼备之人。杨炎才干突出，也是理财高手，史上

著名的“两税法”即由其推行。不过他心胸狭隘，汲汲于权力，上台后肆意打击报复同僚。因与刘晏政见不合，杨将公事异议化为私人恩怨，多次造谣，终于借机将其构陷致死。此事发生后，朝野上下一致为刘晏鸣冤叫屈。多行不义，四处树敌，杨炎终落得个被朝廷赐死的下场。《旧唐书》中对杨的盖棺之论便是：“睚眦必仇，险害之性附于心，唯其爱憎，不顾公道，以至于败。”杨炎虽亡，然有德之人已逝，略有起色的政局也被其再度搞得乌烟瘴气。

由此可见，选用人才，“要严把德才标准”。无论是荀瑶还是杨炎，都缺乏必要的政治品德和个人私德，势必会对国家产生负面影响。德才兼备，以德为先，政治过硬，方堪重任。



朱熹的读书六法

晏建怀

中国历史上，因勤学苦读而成名成家者多如繁星，而将读书作系统研究并形成著述的，则凤毛麟角，朱熹是其中的佼佼者。

朱熹一生，勤奋好学，著作等身，据对《朱子全书》的统计，他流传至今的作品字数多达1400多万字。关于如何读书的著述，在朱熹浩如烟海的作品中，所占比例甚少，但他总结的读书方法，经过弟子和后人的整理，却成为了一本厚厚的《朱子读书法》。朱熹“读书破万卷”，他的读书法来源于他丰富的读书经验，却又浅白易懂，正如钱穆先生在《学衡》一书中所说：“朱子教人读书法，其实人人尽能，真实平易，而其陈义之深美，却可使人终身研玩不尽。”

平易到什么程度？此书开篇一段话充分说明问题。学生陈希周问朱熹读书修学之门，朱熹说：“所谓读书者，只要理会这个道理，治家有治家道理，居官有居官道理，虽然头面不同，然只是一理。如水遇圆则圆，遇方则方，小处小，大处大，然只是一水尔。”多么浅近而通俗易懂的话语。

朱熹读书，总结过六则读书方法，后人谓之“朱子读书六法”，即：循序渐进、熟读精思、虚心涵泳、切己体察、着紧用力、居敬持志。此读书六法因为其简易适用，故成为了历代许多读书人屡试不爽的读书妙法，流传甚广。

所谓循序渐进，就是读书要讲究次序，读一本书如此，读一个合集或了解一段时期的历史也应如此。而且，这个“序”，还不完全是书本目录的顺序，更多的是知识层级和理解程度之“序”，由浅入深、由易入难。

所谓“熟读精思”，朱熹说：“大抵观书先须熟读，使其言语皆出于吾之口；继以精思，使其意皆出于吾之心，然后可以有得尔。”书若不反复读，难免浮光掠影，理解肤浅，古人云：“读书百遍，其义自见”，说的也是这个意思。但熟读而不在气定神闲之时细细品味和思索，则读过的内容，即便字字珠玑、微言大义，也会如风过耳。熟读停留于了解，精思则至于理解。读书止于了解而不能理解，如同掘井至半，每每无功而返。

朱熹说：“学者读书，须要敛身正坐，缓视微吟，虚心涵泳，切己省察。”所谓“虚心”，是朱子鼓励人以虚怀若谷的心态对待读书，对于其中的内容和观点，不要先入为主，以己

度人，甚至穿凿附会。对于某一问题，即便众说纷纭，也要虚心以待。朱熹解释说：“所谓涵泳者，只是仔细读书之异名也。”“涵泳”是“虚心”的落脚点，即读书要反复咀嚼，细细品味，天长日久，必有真知。

对于“切己体察”，朱熹说：“读书不可只专就纸上求义理，须反过来就自家身上推究。”意思是，读书不能一味地在纸上寻求义理，需要联系自身来推寻探究。自己还不能理解的，圣人早就阐述过，我们只有在圣人观点的基础上，结合自身的实际去推究，才能日益精进，有所收获。否则，哪怕“广求博取，日诵五年”，也不过一台“复读机”，终无法融会贯通。

“着紧用力”，自然是指读书当下功夫、花力气，但朱熹所谓下功夫，并非稍作努力的层次，而是超乎常情的努力、超乎常人的功夫。他说：“读书时当将此心葬在此书中，行住坐卧，念念在此，暂以必晓彻为期。外面有甚事我也不管，只一心在书上。”又说：“为学要刚毅果决，悠悠不济事。且如发愤忘食，乐以忘忧，是甚么精神，甚么筋骨？直要抖擞精神，莫要昏钝，如救火、治病然，岂可悠悠岁月？”读书要紧迫到什么程度？如救火，如治病，一刻也不能耽搁。

对于“居敬持志”，朱熹说：“为学之道，莫先于穷理；穷理之要，必在于读书；读书之法，莫贵于循序而致精。而致精之本，则又在于居敬而持志，此不易之理也。”真正要把书读好，达到至精的上乘境界，便须居敬持志。“居敬”，有恭敬之意，亦有安静之意（敬又通静），就是读书要排除杂念，专心致志，心静则诚，心诚则灵。学生问朱熹“敬如何地持”，朱熹回答：“只是要收敛此心，莫令走作（放逸）而已。”

至于“持志”，便是对待读书要如其他大事业、大学问一样，要有理想、有目标、有志向，迈着朝圣者坚定的脚步，十年如一日地朝着目标奋进，才能有所成就。对此，朱熹说得极为简单：“立志不定，如何读书？”又说：“看文字须此心在上面，若心不在，便是不曾看相似。所谓视之而不见，听之而不闻。”

其实，无论“持志”也好，朱熹总结的“读书六法”也罢，方法浅近，贵在坚持。